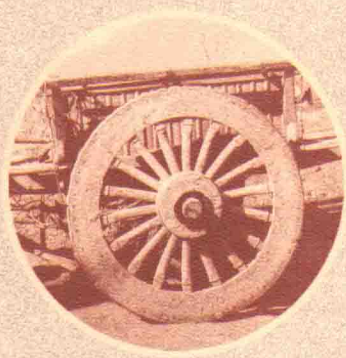




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研究文库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近现代西北社会研究 发展与变革

李建国 尚季芳◇主编



本书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为基础，结合作者多年研究

及实地考察成果，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书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为基础，结合作者多年研究

及实地考察成果，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书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为基础，结合作者多年研究

及实地考察成果，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书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为基础，结合作者多年研究

及实地考察成果，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书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为基础，结合作者多年研究

及实地考察成果，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书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为基础，结合作者多年研究

及实地考察成果，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书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为基础，结合作者多年研究

及实地考察成果，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书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为基础，结合作者多年研究

及实地考察成果，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书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为基础，结合作者多年研究

及实地考察成果，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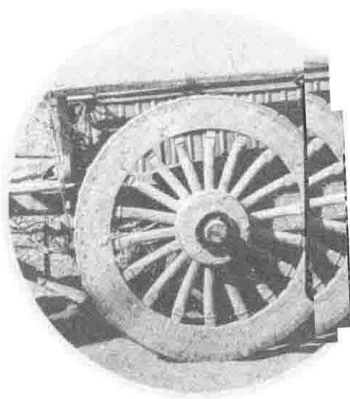
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研究文库
■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

近代西北社会研究 发展与变革

李建国 尚季芳◇主编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现代西北社会研究:发展与变革 / 李建国,尚季芳
主编.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5.12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ISBN 978-7-5490-0967-1

I. ①近… II. ①李… ②尚…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西北地区—近现代 IV. ①K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1119 号

近现代西北社会研究:发展与变革

李建国 尚季芳 主编

责任编辑: 原彦平 李兰玲

封面设计: 苏金虎

出版发行: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gswenhua.cn>

地 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 编: 730030

印 刷: 兰州万易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兰州市城关区黄河北玉垒关 23 号

邮 编: 730000

开 本: 787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15 千

印 张: 20.5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90-0967-1

定 价: 5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们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田 澍

副主任：刘再聪 何玉红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辉 伏俊珺 李并成 李迎春 李建国

李晓英 李家莉 沙武田 尚季芳 张 兵

张 嵘 张德芳 杨惠福 杨鹏飞 俄 军

胡小鹏 秦丙坤 黄兆宏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由

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甘肃文化发展研究院、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考古学、中国史、民族学、世界史重点学科

资助出版

前 言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长期稳定和最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学术积淀深厚。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西北疆域演变与国家稳定、西北边疆环境变迁、西北边疆民族宗教问题、西北边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近年来，西北师范大学充分利用便利的地域优势，主动适应地方文化建设的需要，在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开展系列学术科研活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一、编撰专题学术著作。以西北边疆史地为主题的学术专著有五十多部，其中主要有：吴廷桢、郭厚安《河西开发史研究》，季成家等《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赵向群《五凉史探》，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侯丕勋、刘再聪《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李清凌《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实践》，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研究》，田澍《西北开发史研究》，田澍、何玉红《西北边疆社会研究》，田澍、何玉红《西北边疆管理模式演变与社会控制研究》，田澍、陈尚敏《西北史籍要目提要》，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胡小鹏《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李建国《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尚季芳《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等。这些学术著作或以主题探讨为主，或以资料汇集为主，内容系统、全面，且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二、承担各类科研项目。以西北边疆史地为主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等八十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王三北《中国历代西北开发思维和苏联对外政策》，赵汝清《丝绸之路西段历史研究》，李清凌《元明清三代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研究》，田澍《明清中央政府与蒙藏民族地区政治互动策略研究》和《十四到十六世纪明蒙关系的走向研究》，刘再聪《唐

朝“村”制及西北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研究》和《唐朝“村”聚落形态与基层行政制度“西进化”历程研究》，李并成《历史时期我国西北地区沙尘暴研究》，李晓英《近代甘宁青回族商人研究》，连菊霞《宗教信仰与族际通婚——以甘肃积石山县保安族、回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例》，尚季芳《近现代西北民族地区毒品问题与社会控制研究（1840—1960）》，胡小鹏《晚清至民国时期甘青藏区社会群体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潘春辉《清至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农村用水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李建国《近代西北地区商贸经济及对当地社会发展影响问题研究》，王新春《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与近代中国西北考古研究》，张嵘《我国社会现代化历程中的少数民族发展研究》，刘清玄《天水麦积山石窟洞窟题记释录与研究》，张荣《哈萨克问题与清代西北边疆安全》，李永平《甘肃新出土魏晋十六国文献整理研究》等。这些项目围绕与西北边疆史地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内容展开研讨，主题集中，针对性强。

三、召开系列学术论坛。以西北边疆史地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有：“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讨会”，“庆贺蔡美彪先生八十华诞暨元代民族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第11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文化学术研讨会”，“河洮岷历史文化与甘肃民族史学术研讨会”，“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文化高层论坛”，“甘肃历史文化资源高层论坛”，“甘肃远古文化与华夏文明高层论坛”，“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高层论坛”等。这些论坛吸纳国内外知名专家就当今西部大开发、西北边疆安全、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西北生态保护、西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等前沿课题展开集中研讨，提供学术咨询，具有较强的服务社会与政策咨询功能。

四、加强机构和学科建设。西北师范大学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学科的发展。2010年5月，西北师范大学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获批为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国内专门从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高水平科研平台。目前，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互为依托的科研平台有中国史一级博士点、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甘肃文化发展研究院、甘肃省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等。互为依托的平台之间相互推进，同步发

展。2006年以来,《敦煌学教程》、《简牍学教程》、《西北边疆考古教程》、《西北少数民族史教程》等8部本科生系列教材先后出版,在国内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方面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013年,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民族学四个学科同时获批为省级重点学科,使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建设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五、重视持续发展。近年来,西北师范大学围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在《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权威学术期刊和报纸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七百余篇,不少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截止2009年,汇聚阶段性成果的学术丛书《西北史研究丛书》十册本最后出齐。为了使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能够获得进一步、持续性顺利发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应运而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的编撰,必将不断深化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度,拓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视野。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必将得到持续发展的事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目 录

试析自然和人文环境对西北近代商贸经济的影响	李建国 (1)
近代天津洋行在西北地区的运行机制	
——以羊毛贸易为中心的考察	李晓英 (16)
水陆兼行的特色运输	
——近代甘宁青羊毛贸易的运输网络	李晓英 (27)
由地理和地缘方面论兰州市将来的发展	邹豹君 (42)
近代兰州的私营商业	丁孝智 (46)
再造“西北”: 民国时期旅外学人对西北形象的重塑和建构	
.....	尚季芳 (54)
论民国时期甘肃省的毒品经济与社会变迁	尚季芳 (80)
抗战时期的移民潮对西北社会的影响	李建国 (98)
抗战时期内迁高校与西北地区现代化	
——基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为中心的考察	尚季芳 (108)
经济与思想之改进: 战时工合运动与西北社会变迁	尚季芳 (130)
历史的语境和动力	
——近代回族社会转型的背景分析	张 嵘 (150)
关于甘肃回民起义的缘由和属性探讨	丁焕章 (161)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现代回族经济史研究	田晓娟 (175)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西省分会述评	张 嵘 (185)
近代甘青民族地区度量衡制考议	李建国 (194)
陈养源先生生平事迹考	郑 峰 (203)
林则徐在青陕滇的从政活动	张海声 (211)
杨增新治新时期的民族政策	郑 峰 (220)

杨增新治新时期的南疆乡约	郑 峰 (230)
大革命时期国民军在甘肃的活动述评	任效中 (235)
县长难为：民国时期县级官员的艰难处境	
——以甘肃省为例	尚季芳 (244)
帕米尔地区自古属于中国	吴廷楨 (259)
亦有仁义：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	
.....	尚季芳 (264)
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文化胸怀	党庆兰 (278)
试论政府在西北开发中的主导作用	
——对近代西北开发的反思	李建国 (286)
大开发的真正动力	
——关于中美两国西部开发主体的考察	党庆兰 (295)
环境各异 道路不一	
——当代中国西北开发与美国西部开发环境比较及道路思考	
.....	党庆兰 (304)
后记	(316)

试析自然和人文环境对西北近代商贸经济的影响

李建国

西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商贸活动一直很兴盛。在古代以丝绸之路闻名于世，近代虽无古代繁盛，但商贸活动仍是很频繁的。对近代西北的商贸活动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取得了不少成果：相关论文约有百余篇，于溶春的《解放前新疆对苏贸易性质简论》、马平的《近代甘青川康藏区与内地贸易的回族中间商》、陈泛舟的《民国时期甘青川三省边境的藏汉贸易》等；专著则有厉声的《新疆对苏俄贸易》、林永匡的《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党诚恩的《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等。但研究也有一定局限性，多限于西方对华的经济掠夺，或民族贸易等类问题。本人试图从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入手，对西北近代的商贸活动进行一些探索，以就正于方家。

—

西北地区无论从东到西，还是从南到北，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都是很大的。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同时也造成了各地经济的局限性。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求，与其他相关地区的互通有无就成为必然，这就为西北商贸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首先，从大的方面来看，因自然因素和社会发展水平等制约和影响，农业和畜牧业是西北地区经济的支柱产业，另外就是依附于农牧业

的传统手工业。西北虽有不少城镇，其经济功能更多的是体现在商贸方面，近代工业在西北社会经济中长期份额不大，到1949年，西北五省工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5.6%。^①因经济结构的欠缺，使得许多民众的生产、生活物资需通过与东部地区，甚至国外贸易来获得。据统计1932年：仅经兰州地区输出的皮毛类共计527776斤，水烟共计21515612斤，药材共计7381000斤；输入的棉花为2160480斤，布匹为6670672斤，海菜为265680斤，杂货为85971360斤。^②陕西省从1934年7月到1935年6月，输出棉花价值1218万元，输入棉布1368万元。^③20世纪30年代初，宁夏岁输出土产：甘草约5000担，枸杞2000担，皮张约2000担（每担360张），羊毛1000余万斤，驼毛、羊绒40万斤；输入各货，约13000~14000担，以洋布、斜纹、海菜、糖、火柴、洋烛为大宗。^④据1935年对青海调查，全省输出货物价值730万元，其中畜产品占到了415万元（羊毛180万元、各类皮张135万元、牲畜100万元），另有沙金100万元；输入总值1275万元，其中布匹就占900万，大宗的还有杂货200万元、茶60万元。^⑤新疆1928年到1929年向苏输出棉花、毛皮、牲畜总价值占出口总额的97%，从苏联进口的绝大部分货是工业品，仅棉纺织品一项就占进口总值的62.35%。^⑥很明显，西北地区向外输出的多为皮毛、药材等土特产，输入以棉花、布匹、茶叶等日用工业品为主。

就西北的农牧业而言，分布又是大集中，小分散。如农耕区主要在陕西关中，甘肃河西，宁夏黄灌区，青海湟水流域，新疆伊犁、南疆等地。牧业区主要集中在新疆北疆、青海、甘肃南部地区。陕西北部、甘肃陇东、宁夏南部山区及新疆部分地区农牧兼营。这种产业布局，促使地区间经济相互依赖性加大。特别是西北畜牧业基本是靠天吃饭，而畜牧区又多处于高寒地区，气候条件恶劣，故生产极不稳定，自产难以自足，经济上对外依赖性就更强。如在青海玉树地区，据马鹤天对1937年

① 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② 陈鸿胪：《论甘肃贸易》，《甘肃贸易》（季刊）1943年第4期。

③ 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2页。

④ 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⑤ 高良佐：《西北随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5—86页。

⑥ 于溶春：《解放前新疆对苏贸易性质简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7至9月商贸情况调查：输入的主要货物有28种，除布、茶外，还有面粉、大米、清油、粉条、白酒等农副产品，其中3个月输入面粉达21300斤。^①新疆南疆地区的布鲁特游牧民，“无城无郭”，“无日用杂货店铺”，甚至“衙署所需食物，皆须赴阿克苏采购”。^②所以，对外商品交换在牧业区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大量的畜产品流向农业区，在解决了农业区对畜产品的需要的同时换回大量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各牧区、部落由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历史渊源等方面原因，各自都有较固定的与之通商的主要市场和商人。如青海蒙古族、藏族的主要粮食供应来自甘肃河西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甚至偏远的安西小县城，每年春间“青海番蒙持皮毛、牲畜至此，交换粮食，人众繁杂”^③。而青海湟水流域西宁、乐都一带的粮食，则由粮商用牛皮袋，“实粮于中，紧缚袋口，掷于水中，联缀十余袋作筏，顺流直下”，运销于兰州。^④

牧业区的商品流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牧民或寺院商人把当地的产品运到邻近农业区的贸易中心出售，换回粮食、布匹、茶叶及日用品。如青海湖附近的蒙藏牧民，一年两次驮着羊毛或盐巴前往靠近甘肃河西的丹噶尔等市场“打粮”，因“蒙番在丹办粮，故本境所产之粮半售于蒙番，而食粮转资于境外也”。^⑤北疆“一入秋冬，前后营（俗呼乌里雅苏台为前营，科布多为后营）蒙民群赴奇台购粮，驼队不绝于途”^⑥。一是外地商人将牧民需要的货物驮运到各部落，临时布置帐幕，设市于旷野，或依托寺院，交换皮毛、药材等。20世纪30年代，在青海“每年废历一月后，各商号即运茶叶、布匹等货至番民住所，交换皮毛，夏季河冰稍解，即将换得之羊毛皮张，运往兰州，转运天津出售”^⑦。甘南拉卜楞地区（今夏河县），年输出皮毛值达339116.5万元，^⑧但“年缺粮一千二百五十万斤”，“七成仰给临夏，三成仰给临

①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2页。

② 谢晓钟：《新疆游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

③ 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④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30，兰州：兰州俊华印书馆，1936年。

⑤ 杨景开：《丹噶尔厅志》卷5，《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55卷，1990年兰州古籍书店影印，第841页。

⑥ 谢晓钟：《新疆游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0页。

⑦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⑧ 高长柱编：《边疆问题论文集》，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第442页。

潭”，“茶、盐、糖，则更要仰给于外地”。^①故而内地商人，“每年九月挟款运货而来，翌年四月运载皮货而返”，市场“衣食住行之用品，无不具备”，“五光十色，应有尽有”。^②

其次，西北地区因地理环境等因素，城镇主要分布在古丝路沿线，其余大部地区城镇稀少，但与乡村在经济上相互依赖性却很强。农牧区通过城镇出售自己的土特产品，换回自己需要的工业品和日用品，城镇通过吸收和推销等商贸活动维持和发展自身，各自的需求使得城乡交流也不可或缺。如兰州之所以较兴盛，就是因其位于西北的中枢，“东通秦、豫，曰东路；南达巴、蜀，曰南路；北通宁夏、归化、包头，曰北路；西通新疆、俄境，曰口外；西南通青海、拉萨，曰西路”，在清代是西北的茶销中心，1874年左宗棠整顿茶务，以票代引，当年发行茶票835张，约合茶350万斤以上。^③民国后，“洋广杂货，由东、北两路而来；葡萄、棉花、桂子皮、雅尔缎，由口外而来；川绸、川缎、茶叶，由南路而来；红花、藏香、氍毹、皮毛，由西路而来。至于湖南之散茶，汉口之砖茶，三原之大布，湖北产之蓝布，以及陕西棉花、纸张，均由东路而来，米则来自宁夏。统计以上各项输入，约一千万两左右。至于输出……统计各项，总数在七百万两左右”。此外像新疆之哈密，地当甘、新之要冲，北通镇西，西北通奇台、迪化，西南通吐鲁番，东南通肃州、敦煌，虽“本地出产甚微”，但“为关内外运输货物经由之路”，“是以京、津及陕、甘一带，往迪化、古城之洋广杂货、纸张、布匹，岁经此地者，辄百余万。由吐鲁番来之葡萄、棉花，经此往包头、甘肃者，五十余万。此外则俄商洋行，由敦煌、镇西收买皮毛，汇归于此者，约十余万”。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汉商大小约百余家”，“缠回商人亦百余家”，“俄商亦有四五家”。^④

西北多数城镇的最基本经济功能是商贸，而生产功能则相形要低下得多。故在西北城镇因商而兴、因商而衰是较常见的现象。如新疆的镇西“当清道、咸间，为新疆北路商务荟萃之区”，可与后来的古城相比，

① 徐旭：《西北建设论》，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44年，第65页。

②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5、49页。

③ 升允：《甘肃新通志·建置·茶法》卷22。

④ 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9、151页。

民国后因外蒙古事变，原借道外蒙古的大草地商道不通，“东路之货均不取道于此”，到20世纪30年代，“商况一落千丈。今城内仅存小商十余家，统计一年贸易额不过一二万耳”。及是当地的一些“养驼由京、津运货者，亦均趋古城”^①。但城市一旦兴起后，其发展必然也会使得自身成为一个可观的农牧产品消费市场和一些手工业品生产基地，使城乡关系进一步密切。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兰州，随着城市的发展及水烟业带动周边地区农业的商品化（烟叶种植），“民食不足，每年须赖他处供给，兰市粮行分东西两行，凡由东路榆中、定西、会宁等县运省之各种杂粮均由东粮行经售，平凉、天水、中卫等处运来大米，亦多由东粮行经售。西粮行则专售西宁、永登、临洮等处运来之杂粮”^②。仅青海湟水流域，因有水运之便，商贩每年收购余粮200万石左右，清油4250余担（每担240斤），贩运到兰州销售。^③兰州的一些特色手工业也在不断成长。近代之初，兰州的毛织业很繁盛，“客商来兰州收绒褐（一种毛织布）者岁以万计”^④。其他毛制品，如毡毯、毡帽和毡鞋，品质精美，也行销西北各省。以兰州为中心的水烟业，因土壤和水质关系，烟质俊俏，烟味浓香，在相当一段时间长盛不衰，有厂家约130家上下，年产碧烟、黄烟、棉烟共达30000担，除满足西北本地需要外，还大量输出。仅销往四川的每年约有七八千担（主要是棉烟）。^⑤宁夏银川，因成为省会后人口大增，年需输入粮食7000余石。^⑥西宁则在青海设省后，很快代替丹噶尔成为青海蒙藏贸易中心，并带动了当地马鞍、藏刀等日用小手工业。到1946年，出现了18行47业。^⑦

复次，西北地区自古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区，近代以后民族成分也比较复杂，约有40个民族散布在西北，其中主要有汉、回、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土、羌、东乡、裕固、保安、撒拉等族，其中东乡、裕固、撒拉等是西北特有少数民族。西北地区民族虽然众多，民族

① 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8页。

② 高良佐：《西北随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③ 高良佐：《西北随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④ 吴鼎新：《皋兰县志》卷4。

⑤ 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卷11。

⑥ 高良佐：《西北随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

⑦ 青海省志编委会：《青海省志·手工业志》，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13页。

在地区分布上集中性十分明显。汉族主要在东部及沿河西走廊到北疆的狭长地带，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及河西走廊以南的青藏高原和以北地区。而且其主要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居住区地，藏族主要在青海东南部、甘南地区，维吾尔族主要在南疆、东疆和伊犁地区，蒙古族主要在青海西北部、准噶尔盆地及周边地区，哈萨克主要在北疆地区，回族主要在甘青、甘宁交界地区。蒙古、维吾尔、藏、哈萨克、回五个民族分布面积最广。西北各民族各具特色的经济和文化，为各民族的经贸往来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不同民族间互通有无，商贸活动形式多样，而且非常频繁。汉族地区的集市、骡马大会、维吾尔族地区的巴扎、青海蒙藏地区的歇家，甚至寺院，都是各民族进行商贸活动的重要场所。故西北少数民族大都善于经商，而回族尤以善于经商著称。

西北少数民族善于经商，除生产生活的需要外，还有着很深的文化方面因素。如从宗教及文化方面来看，东部地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汉文化，西北部的伊斯兰教文化，南部的藏传佛教文化，中部则是这三种文化的交汇区。在这三大文化中，伊斯兰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都对商业持肯定和鼓励的态度。如信奉民族最多的伊斯兰教，在其道德伦理观中充分肯定了经商，在《古兰经》中有许多对商业经济及商业道德的规范，明确指出“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重利”^①。在遵守道德的前提下，鼓励穆斯林享受应得的财富。如甘肃临潭的西道堂，堂内穆斯林约400余户，大都在教主组织下经商。该道堂有资本200万以上，^②开有总号“天兴隆”，分号“天兴源”“天兴德”等，1947年还在北京开办了“仁记商行”。藏传佛教经商是大多数寺院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寺院经商方式主要有：直接经营；集资推举“会首”去经营；还有寺院贷款给会做生意人，然后参与分红。如青海塔尔寺不仅寺院，连其下属的四个院都有自己的商业系统。甘肃拉卜楞寺地扼甘、青、川之枢纽，商务十分发达，商业贸易不仅给寺院带来好处，许多喇嘛也借经商聚敛财富。青海南部的玉树地区，有寺院90多所，大都经商，并有约定的集市日，有自己的常年商队，仅结古寺有商业资本10万银元（该寺只是个中等规

① 马坚译：《古兰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② 党诚恩：《甘肃民族贸易史稿》，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7页。

模寺院)，占玉树地区商业资本12%，并有一支50人商队。^①这种文化背景对西北地区商贸业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西北地区有着良好的商业传统。自汉、唐以来西北的丝绸之路古道一直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汉、唐盛世自不必说，汉“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②唐贞观年间，“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③。13世纪蒙古人崛起，横扫欧亚大陆，摧毁了许多东西方贸易的障碍，建立了庞大的驿递交通网络体系，为商贸交往提供了巨大便利。清王朝建立后，也极重视与西北边境地区各国的交往，特别是在平定准噶尔后，与哈萨克等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每年都要从内地调拨大批绸缎、茶叶以用于同周边地区的贸易，乾隆中后期，每年清王朝用于新疆北疆地区绢马贸易的绸缎约15000匹上下。甚至把贸易作为一种安边的政治手段，“在卡外恭顺各部，自当按照奏定章程，通市互易”，“霍罕伯克即经悔罪输诚，自当赦其即往，准令办给照票，并免课税”。^④除官方控制的贸易外，清政府还鼓励商民前往新疆贸易，“若有愿往者即人给印照，听其贸易”，并给赴新疆贸易商减税优惠，如“当地回民贩卖牲畜所征之税为其营业额的二十分之一，外来商人则为三十分之一”。^⑤

近代以后政府对西北贸易仍较重视，左宗棠时，对西北驿道进行了大规模整治，使得陕、甘、新间道路状况大为改善，不仅保证了当时的军需民用，也为西北地区商贸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极大地便利了西北与内地的商贸联系，平均每年仅经甘运销的茶叶就达15000余担。^⑥抗战时国民政府在战时国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公路的大规模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西北交通事业的进步，可以说，西北地区的公路主干架，基本是在抗战时形成

① 翟松天：《青海经济史》（近代卷），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7页。

②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③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30。

④ 《清宣宗实录》卷149、卷214。

⑤ 《清高宗实录》卷656、卷605。

⑥ 《甘肃公路交通史》1册，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7年，第366页。